唐研究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第五卷

Volume V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北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99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研究　第5卷/榮新江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
ISBN 7-301-04393-7

Ⅰ.唐…　Ⅱ.榮…　Ⅲ.古代史-研究-中國-唐代-文集　Ⅳ.K242.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1999）第68943號

書　　名：唐研究　第五卷
著作責任者：榮新江主編
責任編輯：劉　方
標準書號：ISBN 7-301-04393-7/K·277
出 版 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網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電　　話：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4140　編輯部 62752032
電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　　版：北京軍峰公司
印　　刷：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 行 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36.5印張　563千字
1999年12月第一版　199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58圓

主　編：榮新江

編　委：（以拼音字母爲序）

陳尚君　高明士　葛承雍　葛曉音

葛兆光　黄　征　劉健明　羅　新

妹尾達彦　寧　欣　齊東方　榮新江

太史文　王小甫　閻守誠　張國剛

※　※　※

Chief Editor：Rong Xinjiang

Editors：

Chen Shangjun　Ge Chengyong　Ge Xiaoyin

Ge Zhaoguang　Huang Zheng　Kao Mingshih

Lau Kin-ming　Luo Xin　Ning Xin　Qi Dongfang

Rong Xinjiang　Seo Tatsuhiko　Stephen Teiser

Wang Xiaofu　Yan Shoucheng　Zhang Guogang

目　　錄

論文

盛世的平庸——八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知識與思想狀況 …… 葛兆光 (1)
The Maitreyist Huaiyi (D.695) and Taoism.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
…… Antonino Forte (35)

跋康熙時舒木魯明鈔本《唐摭言》 …… 黃永年 (41)
唐代小說文獻研究 …… 程毅中 (45)
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錄 …… 榮新江　徐　俊 (59)
唐代牡丹 …… 翁俊雄 (81)

隋代文散官制度補論 …… 閻步克 (93)
試論隋與唐前期中央文官機構文書胥吏的組織系統 …… 葉　煒 (123)
"咒禁博士"源流考
——兼論宗教對隋唐行政法的影響 …… 朱瑛石 (147)
從"漢縣"到"唐縣"
——三至八世紀河北縣治體系變動的考察 …… 王德權 (161)

楊素政治生涯考析 …… 劉健明 (219)
Installing an Heir: Factional Politics in the Court of
Tang Taizong …… Andrew Eisenberg (247)
唐朝後期的朔方軍與西北防邊格局的轉變
——以德、順、憲三朝為例 …… 李鴻賓 (269)
李德裕與牛李黨爭考述 …… 周建國 (299)

Sino-Arab Relations during Tang Dynasty 618-907 A.D. ……
…… Gaafar Karrar Ahmed (323)

漢唐間雲貴高原地區農業生產述略 …… 張澤咸 (367)
白居易“氈帳詩”所見唐代胡風 …… 吳玉貴 (401)

唐昭陵陪葬墓地佈局研究 …… 沈睿文 (421)
西安新發現唐裴伷先墓誌考述 …… 葛承雍 李穎科 (453)
唐慈恩寺普光法師墓誌考釋 …… 杜文玉 (463)
唐張守珪墓誌淺釋 …… 李志凡 (469)

書評：

王邦維《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 …… Max Deeg (479)
T.H.Bar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 劉屹 (486)
陳國燦、劉健明編《〈全唐文〉職官叢考》 …… 張國剛 (496)
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 …… 榮新江 (499)
楊希義等《唐代軍事史》 …… 楊泓 (504)
石見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國際秩序》 …… 韓昇 (508)
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 …… 榮新江 (515)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 …… 榮新江 (518)
朱大渭等《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 …… 何德章 (522)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 …… 張國剛 (527)
楊際平、郭鋒、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係》 ……
…… 凍國棟 (529)
Elfriede R. Knauer, *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 …… 榮新江 (533)
張固也《新唐書藝文志補》 …… 陳尚君 (536)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 …… 陳尚君 (54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六頂山與渤海鎮》 …… 齊東方 (545)
氣賀澤保規編《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 …… 劉健明 (55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書目…… (558)
第五卷作者工作或學習單位及文章索引…… (569)
《唐研究》簡介及稿約 …… (571)

Contents

Articles

The Mediocrity of a Golden Age ····· Ge Zhaoguang(1)
彌勒教者懷義(695年卒)與道教 ····· 富安敦(35)

A Postscript to the Handwritten Copy of
Tang Zheyan by Shumulu Ming ····· Huang Yongnian(41)
Problems in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ang Narrative ····· Cheng Yizhong(45)
Studies in Three New Manuscripts of Tang Poetry from
Dunhuang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 Rong Xinjiang and Xu Jun(59)
Peony in the Tang Dynasty ····· Weng Junxiong(81)

Some Problems on the Origin of the Civil Official Title Rank of Sui
Dynasty ····· Yan Buke(93)
The Petty Official System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Sui and the Early Tang ····· Ye Wei(123)
Origin of the Zhoujin boshi ····· Zhu Yingshi(147)
A Case Study of *Xian* Capital in Hobei
from Han to Tang ····· Wang Te-chuan(161)

On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Yang Su ····· Lau Kin-ming(219)
立嗣——唐太宗宮廷中的派系政爭 ····· 艾安迪(247)
The Shuo-fang Regional Commanding Office and Changes in the
Defensive Structure of the Northwest Areas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Tang ····· Li Hongbin(269)
A Study of Li Deyu and the Strife between the Niu Faction and
the Li Faction ····· Zhou Jianguo (299)

唐代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 …… 加法爾·卡拉爾·阿赫默德(323)

An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Yun-Gui Plateau during the Period from Han to Tang …… Zhang Zexian(367)
The Exotic Taste of Tang Times: A Study of the "Poems of the Felt Tent" by Bai Juyi …… Wu Yugui(401)

A Study of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emetery of Zhaoling [Mausoleum] in Tang Dynasty …… Shen Ruiwen(421)
A Textual study of the Epitaph of Pei Zhouxian of the Tang Dynasty Recently Excavated in Xi'an …… Ge Chengyong and Li Yingke(453)
Investigation on inscription of Monastic Puguang of Tang Ci'en Temple …… Du Wenyu(463)
A Brief Note on the inscription of the Tang Dynasty's Zhang Shougui …… Li Zhifan(469)

Reviews …… (479)
New Publications …… (558)
Contributors …… (569)

《唐研究》第五卷
1999年，1—33頁

盛世的平庸

——八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知識與思想狀況

葛兆光

755年以後的安史之亂可能是唐王朝甚至整個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捩點[1]，不過，在思想史上，這一政治史上的事件祇是一個便於記憶的象徵，在歷史的記憶中劃分着兩個不同的時代，而實際的思想史變化，大約綿延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舊時所説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概在任何思想史上都可以算是普遍真理，除了天才思想家的劃空而過，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演變其實都是很緩慢的，需要長時段纔能顯現出來它的意味。因此，儘管古代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深刻轉型的大輪廓，是在以後一個世紀纔逐漸浮出地表，但是，轉型的徵兆卻早已在這個世紀凸顯。於是，我仍然要從八世紀上半葉開始，追溯後來那一次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深刻轉型的背景歷史。

八世紀初的唐王朝，其實剛剛經歷了一次思想與秩序的雙重危機。武則天取代李氏天子，以大周換了大唐，不可思議地以女子之身當了皇帝，“牝鷄之晨，唯家之索”[2]，不僅傳統的“婦人不得預外政”已經失效，就連“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的宇宙論依據[3]，似乎也受到嚴峻的挑戰；改朝之後的大周，“旗幟改從金色，飾以紫，畫以雜文”，作爲王朝依據的五行五德五色象徵，也已被改變以遷就新的權力，而象徵王朝在天文時間中合理性的曆法，也在載初元年被改變，“依周制建子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改舊正月爲一月”；符瑞常常是上天眷顧的暗示，原來傳説上天曾降符瑞給李唐，如今卻降給了武周，一塊後來被稱爲“天授聖圖”的石頭在洛水被發現，據説上面寫着“聖母臨人，永昌帝業”，連歷來象徵與天地神靈溝通而且獲得上天認可的明堂大祭，也由武氏親自舉行過了[4]。與此同時，“道在釋前”的

原則改成了“令釋教在道法之上”，思想的界限已經混亂；過去相當嚴格的取士途徑，也突然變得非常寬松，一大批並非貴族子弟的士人，從邊緣進入中心，使過去等級清晰的貴族社會及其建立秩序的禮法、傳統的倫理與道德也漸漸失去了約束力。在那些年，這個强悍的女性曾經把“天”、“地”、“日”、“月”等字都改了寫法，這仿佛是一個象徵，象徵着傳統思想與秩序即將面臨的天崩地裂、日月顛倒[5]。

雖然，這一切在八世紀初似乎已經停止，神龍元年也就是705年，唐中宗復位：

> 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6]。

但是，事實上思想和秩序崩壞的慣性依然存在，它並没有隨着“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的恢復而重新恢復到原來的軌道。祇要看看發生在八世紀初的以下故事就可以明白：原來深通儒學的學術領袖孔穎達曾經擔任過的國子祭酒，神龍元年（705）由一個叫做葉淨能的道教信仰者擔任着，思想世界的主導權仍然混亂；儘管有人在武氏死後一再引經據典地强調“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大道，善善著，惡惡明也”[7]，而武三思居然還可以爲所欲爲，説“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善惡是非的倫理似乎一方面失去了輿論的制約力，一方面也失去了普遍的適用性；安樂公主自己可以“賣官鬻獄”，而且可以“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政治秩序在這種挑戰下，也已經如同兒戲；而剛剛重登帝位的唐中宗在景雲元年（709）帶着一大批后妃到梨園球場，“令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逛踣地，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8]，隨着君臣禮儀應有莊重與嚴肅的消失，過去奉行的“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禮”的原則已經在這種戲謔中被瓦解了[9]，稍後，本來擁有充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之間的嬗代，其實也充滿了爾虞我詐和鈎心鬥角，這種頗顯殘酷的現象，使父子兼君臣之間似乎天經地義的倫理秩序，似乎也在權力與利益的衝突中崩潰了[10]。

八世紀初的中國官方並不是没有重建思想與秩序傳統的願望，這種願望在唐玄宗開元時代曾經一度很强烈[11]。開元二年（714），他不僅下令沙汰了萬

二千“僞妄”的僧尼，而且聽從張廷珪和袁楚客的上疏，“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開元四年又曾“殿庭策試”天下縣令，使四十五個濫竽充數的人被迫辭官“放歸學問”[12]。在後來的若干年中，他又一再親自出面，對最重要的明經與進士的學風進行整頓[13]，而且令臣下整理四部圖書，由元行沖編了《群書四錄》，建立了麗正書院，聚集了一批文學之士以爲天下表率[14]。其中，特別是爲了重新確立思想與秩序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的一系列象徵性舉動，如開元九年至十三年間命令僧一行重新製造新的曆法，南宮説重新測量天地，製造水運渾天，對王朝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象徵性依據宇宙天地重新加以確認[15]；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唐玄宗封禪泰山，“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祭皇地祇於社首……幸孔子宅致祭”，對國家奉天承運的神聖性和政治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再次加以强調[16]，開元二十年，《開元禮》修定，在祭祀中，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而祈谷、大雩和明堂的儀式，都要祭祀昊天上帝。他似乎終於完成了對“天”與“人”的秩序的重建，宇宙、神靈與人間帝王之間的秩序，似乎再次在國家禮典中被固定下來[17]。

可是，《開元禮》大體祇是《貞觀禮》和《顯慶禮》的翻版，封禪和祭孔雖然依照舊制强調了上天的旨意和思想的權力，但它也祇是舊戲重演，重新測定的天地和重新釐定的曆法，雖然按照舊的思路它在政治層面確認了王朝的合理與合法性，但在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已經引不起任何新的興趣。這是一個傳統的知識與思想已經失去了魅力的時代，七世紀中葉至八世紀中葉的中國，正處在“盛世的平庸”之中，不必追究唐玄宗個人作風的轉變，其實這是因爲主流知識思想已經不再具有自我調整的能力，於是它也不再具有判斷當時社會問題的洞察力。當主流的知識和思想逐漸失去了對當時社會問題的診斷和療救能力，也失去了對宇宙和人生問題的解釋和批判能力的時候，往往出現很奇怪的現象：它一方面被提昇爲籠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一方面逐漸淪落爲一種無須思考、失去思想的記誦知識，它祇是憑借着政治權力和世俗利益，維持着它對知識階層的吸引力，在一整套精致而華麗的語言技巧中，知識階層勉强翻空出奇，維持着它的生産和再生産，就像唐玄宗自己説的那樣，“問禮言詩，惟以篇章爲主，浮詞廣説，多以嘲謔爲能，遂使講座作俳優之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學堂成調弄之室”[18]。可是，與此相對照的是，在八世紀上半葉，過去作爲邊緣的佛教、道教，卻成爲那個時代最活躍的、最富於生機的知識、思想與信仰，過去並不佔主流的異族生活方式與觀念形態，也漸漸成爲那個時代最新鮮、最風行的時尚，仿佛春秋戰國時期的那句話説的一樣，“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絶如綫”[19]，支脈對主流，邊緣對中心，已經形成了無言的威脅。

在儘管總是被譽爲“盛世”，卻被過去思想史或哲學史當作“空白”，而在教科書中被輕輕放過的八世紀中[20]，我提醒讀者注意以下一些也許對當時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有並不劇烈但很深刻影響的現象。

一

首先，知識在這個時代逐漸教條與簡化。歷史似乎有這樣的慣例，大凡主流知識與思想已經在權力的支持下成了壟斷性的政治意識形態，作爲考試的内容、昇遷的依據，並與個人的利益直接發生關係時，這種知識與思想會很快成爲一些教條，並很快地簡約化成爲一種供人復述與背誦的内容。同時，傳遞與複製這種僵硬而且教條知識或思想的簡約化文本，也會很快隨着教育、考試與社會交際的需要而大量被傳鈔、背誦。儘管也有人一直相當固執地恪守傳統文本的完整性和權威性，比如曾經執掌文柄的張説，就極力反對把傳統禮類經典進行分類改編，痛斥“以類相比，有同鈔書”，“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絶”，但這種高貴的保守態度畢竟止不住普遍的世俗需求[21]。富於誘惑力和影響力的科舉考試對士人的知識與思想的趨向是至關重要的，不僅當時明經的考試制度，“諸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絶句或年月日”，進士的考試制度，“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22]，而且那些考題的範圍與評判的取向，也常常在向士人暗示着一種學術與思想的導向，例如那個時代被視爲最優秀人才的進士試中，題目引導着應試者挖空心思憑虚想象、搜盡枯腸堆砌詞藻，而限定的韻腳，則有意無意地限定着思想與内容的取向，至於文詞雅麗科與博學宏詞科的題目，也同樣引導着這種知識與思想的裝飾性質[23]，就連對於哲人奇士陰淪屠釣科、賢良方正科、知合孫吴可以運籌決勝科的對策的取捨，也同樣以文章論優劣，充滿了華而不實的色彩[24]。於是，正如趙匡《舉選

議》中説到的，“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25]，當更多的普通的知識階層已經不再擁有文化貴族那種從容不迫的閱讀閑暇、不計功利的經典素養、世家大族的文化傳統，而急切需要能夠應付考試以換取利禄的實用知識的時代，舊的知識很難避免遭遇這種被教條和簡化的命運[26]。

舉一些例子。在七世紀以後曾經流行着各種關於人際交往、禮數規則的禮儀手册，現存的這類書中，雖然祇有 P.3900 與 P.3681 被確認爲七至八世紀之間，但我相信這種簡約的禮儀手册在八世紀也曾經非常流行[27]。本來，每個士人都必須閱讀的經典中，《儀禮》有“鄉飲酒禮”、“士相見禮”，《禮記》也有“少儀”、“内則”、“鄉飲酒義”等等，但是在那個時代，那種對符合身份的禮儀十分自然嫻熟的貴族世家已經不多，更多的人在相對財富與身份有所依憑的情況下，祇是需要模倣貴族世家的高尚典雅，於是需要一些便於背誦與記憶的簡約條文，一方面提醒自己維持身份地位，一方面應付各種臨時場合。正如後來的《新集兩親家接客隨月時景儀》的序文中所説的，“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臨時倉悴，目不知所措”[28]，於是，在普遍的世俗的需要中，這種簡約化的入門手册，就取代了專門的經典條文。而魏晉時代那種表現着貴族世家相當瀟灑與從容的書札，在這個普遍世俗的社會中，被裝飾性、摹擬性很强的尺牘範本所替代，而據説是許敬宗編撰的《書儀》，臚列節氣時候用的套話、按照月份提供一些表示問候的句子，給出一些必需的首尾格式，以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駢文，把對朋友親人的思憶眷念和季節變化的感受體驗，統統變成華麗堆砌的詞語拚盤，也使過去人間交往的真情實感與舒卷自如的文人書札，變成了標準尺寸的零件裝配[29]。

更有趣的例子，也許是敦煌文書中保存的不少曾經在八世紀前後流行的小型類書兼童蒙讀物，這是思想史留下的一些使人可以考察當時的一般知識水準和普遍思想狀況的文本[30]。在敦煌發現的文書中，有若干種過去祇爲文獻學家看重，卻很少被用於思想史研究的文獻，這就是那些知識水準並不高明的小型類書。這種把妙語雋詞分類抄在一起的傳統，可能很早就有。《逸周書》的《周祝》、馬王堆發現的古黄帝書《稱》、《淮南子》裏的《説山》《説林》等等，其實就是證明。最近公佈的《郭店楚墓竹簡》中，也有四種被命名爲《語叢》的文獻，它們和其他幾種竹簡都不一樣，一是簡長祇有 15—17 釐米，二是有

三道編綫，三是内容屬於雜鈔，整理者也認爲與“《説苑·談叢》、《淮南子·説林》類似”[31]，大概也是便於攜帶的叢鈔之類。可是，這種東西可能從來没有像這個時代這樣流行。從七世紀到八世紀，官方所編的類書，已經以它的分類秩序基本確定了知識世界的格局，相當多私人所編的類書就追隨這種格局繼續編纂，並無意中强化着這種宇宙與社會的秩序，復述着這種秩序中的知識，現存的敦煌各種類書就是依照這種現成的格局，把各種知識簡化之後，填充在這個模式中的。其中，有約成書於高宗年間（約 652—658）的杜嗣先《兔園策》、佚名《類林》、《隨身寶》、武后時代的李若立《籯金》、約成於八世紀中葉或稍後的《蒙求》、《對語》及《新集文詞九經鈔》等等[32]。在這些類書裏包括了每一個士人都需要時時可以脱口而出的，關於國家的知識、關於歷史統系的知識，關於宇宙的知識，關於道德與秩序的知識，甚至包括一般生活的知識。正如那波利貞在討論《隨身寶》時所説的，它是“庶民常識的百科全書，它所包括的天地開辟以來的傳説、日月星辰的知識、人民種族、四時八節的曆數、山川形勢、王朝更替、飲食器用的起源、忠臣孝子的軼事、陰德陽報的實話、社交心得、道德實踐方法等等”[33]。比如現存《兔園策府》第一卷是“辨天地”、“正曆數”、“議封禪”、“征東夷”、“均州壤”，雖然我們不能看到它的全貌，但這第一卷的目錄就已經使我們知道，它試圖囊括所有知識；而《隨身寶》也是從“天地開辟以來”説起，大到日月星辰、陰陽寒暑、四時八節、三皇五帝、三川八水、五岳四瀆，小到士人應當避免的十種“劄室之事”、十種“無去就”之事，五種“不達時宜”、五種“無所知”、五種“不自思度”以及“六痴”、“八頑”等等，幾乎無所不有；至於年代不明的《孔子備問書》則包攬了“何謂天地”、“天何謂禁”、“天爲地蓋者何”、“天何以圓地何以方”一直到“何謂天子”、“何謂五行”等等甚至是很具體的社會生活問題，把當時知識、思想的所有根本性問題全部囊括在内，用經典所提供的自然、歷史與社會知識對它進行確定無疑的解釋[34]。因而《籯金》和《新集文詞九經鈔》的序文正是這樣説的，當“述作多門，衆製蜂起”的時候，它“包括九經，羅含内外，通闡三史，是要無遺，今古參詳，禮儀咸備”[35]。同時，這些小型類書還兼有童蒙課本的作用，相當多的士人的基礎知識就是從這種課本中得來的，包括那些我們現在以爲是很高明、很深邃的哲人文士也不例外，像著名的李華在

給《蒙求》作序的時候，就稱贊這種小類書是“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於諷習，形於章句”[36]。這種閱讀方式是如此有效，以至於唐玄宗也請張説、徐堅和韋述等編一本《初學記》，“撰集要事並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37]。

這是没有辦法的，儘管這些類書在古代精英階層的士大夫的筆下，常常是嘲諷的對象，仿佛没有學問或没有文思的人，在搜腸刮肚卻還是没有詞的時候，衹好用它來搪塞充數。但是，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類書是這樣一些文本，它在把經過確認的共識，經過簡約化方式表現出來，並以最便於攜帶、背誦的形式充斥人們的記憶，也充當每一個受教育的人的啓蒙讀物，從一開始就成爲他們知識思想和信仰的底色，今後無論如何皴染，它都將頑强地顯現出來，它不僅是童年經驗，也是基本知識。然而在八世紀，這些知識與思想雖然都精確地採自最重要的經典，卻已經成了背誦和應急的文本，它缺乏内在信仰力量、缺乏實際生活意義，使它成爲徒具裝飾性的條文，它失去了與之相符的社會秩序與結構，於是，它成爲懸浮在生活世界之上的文字形式，失去了診斷和批判當時社會問題的能力。

二

其次，思想也隨着知識階層的結構性變化而越加趨向於裝飾與表面。這與當時知識的世俗化趨向當然是分不開的，正如陳寅恪很早就指出的，從武則天到唐玄宗時代，唐代社會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外廷之士大夫”逐漸取代原來的“關隴貴族”而崛起[38]，由於仕途開放，使教育越來越普及，而教育的普及，反過來又使仕途多門，在大量士人擠在“選官”之途上的時候，知識與思想的性質在逐漸變化。西方思想史家曾經注意到，甚麽人實際受到教育、甚麽人適應改變了的教育體制、教育的目標使社會風尚有甚麽樣的改變？這些本來屬於教育史的現象都曾經對知識史和思想史有相當深刻的影響[39]，以此來看唐代的思想史也是如此。

本來，應試合格的人還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纔能詮選官員，但武則天時代以來，“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

以至於張鷟爲歌謠諷刺“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脱校書郎”和“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面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40]；本來，“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耻”[41]，兩監的學生，多是貴族子弟，但是，據《新唐書·選舉志》載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疏説，開元時代，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而兩監祇有一二十人，即以鄉貢進士出身的，是兩監的五至十倍，而“流外入仕各色人等”即從其他途徑得爲官吏的，則更有二千人之多，又是明經、進士的二十倍，等級秩序清晰的貴族社會在逐漸瓦解中[42]，正如陳寅恪指出的，大體上從武后時代起，新興階層就已經通過科舉，逐漸替代舊的貴族。然而，新興階層的知識興趣與思想取向的世俗意味和實用傾向，與原來的貴族士人是相當不同的，正如李肇《國史補》中説的，開元以後，“物態澆漓，稔於世禄，以京兆爲榮美，同華爲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

促進這種新興階層的知識興趣與思想取向成爲普遍社會風尚的一個原因，是當時社會的流動性，流動瓦解了傳統社會中貴族以姓氏、宗族而居的固定的區域性空間結構，由於長期的社會穩定與財富增長，八世紀尤其是前半期的士人們可以很方便地遷徙和旅行，“南游荆襄，北至太原、范陽，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千里不持寸刃”，這種社會結構的巨變和文化空間的擴張對於思想史的影響相當深刻。正如後來柳芳在討論氏族時説的，自隋代以來，過去地域、身份、財富、職業相對穩定的社會已經漸漸解體，由於“罷鄉舉，離地著”，所以“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耻，士族亂而庶人僭”[43]，他們使過去相對穩定的秩序，以及維護這種秩序的觀念都發生了很大的混亂。六朝時代大世族居住空間的一致性、貴族知識分子出身與前途的獨佔，以及由此免除世俗考慮而追求思想超越的習慣，隨着貴族社會的解體已經不復存在。八世紀時，家族取代了宗族成爲社會的基礎，宗族的瓦解使通過察舉和推薦成了不切實際的空想，而仕途的開放，又使大量處於文化邊緣的、出身低微的士人進入現實政治生活參與權力與利益的角逐，由於需要現實政治生活中權力與利益，過去貴族式的莊嚴和自重都開始被拋棄，一些世俗的理想開始成爲公開的時尚。這時，士人的生活不再是傳統尊崇的儉樸和莊重，而是奢華和輕浮，理想也不再是超越世俗之上的清高和灑脱，而是世俗的地位和財富，依賴取得社會

聲望的資本，也不再是知識的淵博和思想的深刻，而是文詞的華麗和想象的豐富。記憶與背誦的能力成了評價一個人的重要標準，詞匯與韻律的嫻熟成了博取聲望的有力工具，如應“下筆成章”、“才位高下”、“詞標文苑”等三人科，“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號稱“萬揀萬中”，被認爲是“天下第一”的張鷟，其實祇是一個“好爲俳諧詩賦”，以華麗文詞見長的文士[44]。又如常敬忠“一遍能誦千言”而被張説賞識，“拜東宮衙佐，仍直集賢院”。蕭穎士一閱可背誦古碑，不僅使兩閱三閱的李華、陸據甘拜下風，而且這種背誦能力也成了社會評價的參照系數，“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45]，在普遍的社會風氣中，士人們“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虚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46]，中唐人沈既濟在痛定思痛之後有一段話説得很真切，“太平君子，惟門調户選，徵文射策，以取禄位，……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其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彦轂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歗稱相騰。或肩結鉤黨，私爲盟毀，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爲談謔，無所不至焉”[47]。在這些新崛起的、不斷從四方向中央流動的士人那裏，不僅傳統社會中的宗族與地域重叠的社會結構逐漸解體，連以禮法爲基礎的生活模式和觀念系統也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

可是，舉國對於這些新興階層的崇敬，以及上下對這種地位和聲望的普遍追求，刺激了相當多的邊緣士人往來追逐，這種知識階層的大範圍流動，雖然使得相當多過去祇能輾轉沉淪於長安之外的區域範圍内的邊緣士人，可以越出原來被限制的狹窄範圍，進入知識的生産與流通領域，也進入當時思想與信仰世界的中心，並且深刻地改變着社會理想。但是，儘管過去單一的話語世界變得衆聲喧嘩，可是，知識並没有吐故納新，思想也脱離了現實的批評，過去推崇的篤實莊重的經學，漸漸被輕浮華麗的文學所替代，射策的題目和答案常常如同兒戲，行卷的文章倒比嚴肅的著述更容易贏得聲譽，詩歌的寫作成了殫精竭慮的主課，聲韻講究的賦體表達着並不深刻的意思。文學是這個時代的風尚，知識與思想的生産與再生産，常常要依賴裝飾性的文學詞語的推陳出新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